

《史籍考》编纂问题新探

——周震荣《上李观察书》考析

李 金 华

乾隆年间,四库馆开。《四库全书》的编纂刺激了清代考据学的发展,使我国古代学术从此步入对传统学术进行全面总结和整理的阶段;同时编纂的《四库全书总目》,使清代目录学的发展呈现空前的繁荣,激发了私人编纂目录著作的热情。乾隆五十二年(1787),毕沅及其幕府编纂《史籍考》,就是一种反应。《史籍考》是一部大型的史学专科目录著作,该书著录宏富,“不论书之存否,但有见于古今著录,或群书所称引,苟有名目著见,无不收录考次”^①。自乾隆五十二年周震荣向毕沅提出纂修此书,中经几番周折,历时六十年,先后有章学诚、毕沅、洪亮吉、凌廷堪、武亿、谢启昆、胡虔、许瀚等十六位学者不同程度地参与。虽然最终稿本毁于火灾,但《史籍考》的整个撰修历程,在清代学术史和史学史上仍占有重要的地位。

关于《史籍考》编纂的缘起,在乾隆五十四年(1789)章学诚写给毕沅的信中讲到,“丁未之仲冬,其端自永清周尹发之”^②,即最早提出编纂《史籍考》的是周震荣。因此,周震荣作为编纂《史籍考》的最早提出者,似当不容置疑。但新近发现周震荣《上李观察书》一文,却显示了值得进一步考析的史实。

一、李调元首先提出编纂《史籍考》

周震荣《上李观察书》,笔者发现于周震荣文集《四寸学残存》^③抄稿本中,篇幅不大,内容重要,足可显现周震荣见识,故略引如下:

昨章进士来,仰知阁下将撰《史籍考》,此不朽盛业也。康熙中,朱氏彝尊作《经义考》三百卷,毛氏奇龄叹为洋洋大观。奇龄目空今古,非妄许人者。朱氏此书,初名《经籍存亡考》。经之籍繁矣,史实倍之,朱氏去今又五六十年,好学之士如林,岂无志于是者?而缺焉莫继,则才不逮,力不足

①章学诚:《史考释例》,《章氏遗书·补遗》,《章学诚遗书》,文物出版社影印本,1985年。

②章学诚:《上毕制府书》,《章氏遗书·补遗》。

③周震荣:《四寸学残存》一卷,清末嘉善曹秉章抄稿本,复旦大学图书馆古籍部藏。

也。今圣天子稽古右文,特开四库馆,山崖屋壁之书,昔人悬千金不得者,尽献于朝,焕然炳然,两曜合璧,五星联珠,开辟以来,未之有也。阁下博闻强记,过于朱氏,藏书至十馀万卷,又官通州,去京师近,馆阁中经师硕学,皆以文字相交,天待阁下不为不厚,阁下自命不为薄也。《史籍考》体例自宜略依《经义考》。然《经义考》亦有未尽醇者,历代《艺文志》有小学一门,《尔雅》、《三仓》,训诂一例之书也,乃有《尔雅》,无字书、韵书,则小学不备。经学有经解一门,而经解有专门之解,有通经之解。今专经之解如杜预、何休,通经之解如刘向、许慎,俱著于录;而班固《白虎通》之等,亦经解也,因书名无经解字,辄轻删去,又何以独载刘氏《七经小传》之流乎?诸如此类,虽不足为朱氏病,然亦后人考镜得失之林已。著述之必先定体例,犹造车之先定矩,宣沟洫之必准耜耨也。史部分类十七,肇自《隋志》,大纲大法于是乎在。目录、文集二门,俱始《唐志》;史钞一门,始于《宋志》,皆前事之师也。史有大原,史有专官。自黄帝六史以来,经传凡属史书一门,无论有书无书,均宜考订,名之曰古史,列于正史一门之前,乃史学大原也。至于史官建置,刘氏知几考证已详。自唐以来亦须遍考,编于各类之末,以昭职守。经史子集,分列四库,由来旧矣,然史所赅极广,有宜采于经、于子、于集兼及类书者。文中子云:“圣人述史有三: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春秋》是也。”今按,《春秋》、《尚书》,俱是史学纲领,其后《汉魏春秋》、《汉魏尚书》,乃得有所统宗。《周官》为职官之祖,《仪礼》为仪制之祖,《礼记》为记传之祖,莫非史学渊源。《诗经》观政考俗,所关殊大,其后选家大部因诗存史之篇,当附其下。诸经既关于史,则本经白文即当著于录,而经义已有其书,但注“详《经义考》”,以见详为表里之意。至经注经学诸书,已归经部,无烦重见。此其采于经者也。如吕不韦《春秋》、韩非《储说》,关于记事之篇,不可不立法参取。小说向入子部,今宜取以入史部,以说部附之。野史杂记,明末诸人中有违碍犯忌讳者,列其名,注明应毁未毁字样,以归醇正。类书向入子部,宜采有原委者,如《博物》、《典汇》、《经济类编》之等,入故事门。《金石录》、《石墨镌华》之等,旧归子部技艺门,宜改入目录一门。取材于集部者,如汉、唐、宋、元诸家之碑碣记传状谏,乃史氏传记一门之要删,必取摘篇卷,著于录,以成大观。凡文集中诏诰奏议,旧归集部者,宜采篇卷,入故事门。《新唐书志》有文史一门,论史诸书皆入集部,殊非通论,宜取论文诸书有论史者,概入史评之下。其史评一门,如刘知几《史通》、刘餗《史例》之等,专论史例者也;尹起莘《发明》、刘友益《书法》之等,发挥义例者也;汪克宽《考异》、吴缜《新唐书》、《五代史纠谬》之等,专于考订者也。宜将文史一门,分别巨纲细条,别为史评一门。史评之外,又有史学,如司马贞《索隐》、张守节《正义》、服虔、应劭诸家《汉书注》之等,宜仿《经义考》,别出本经,自为史学一门。以上诸条,记忆所及如此,未足尽《史籍考》之体例也。

周震荣《上李观察书》首先肯定编纂《史籍考》的学术意义和“李观察”承担此项编书工作的得力之处。那么,书中的“李观察”(“观察”是对道员的尊称)究竟是何人?首先,书中称章学诚为“章进士”,而章学诚为乾隆四十三年(1778)^①进士,可知此信写作时间上限为乾隆四十三年。据周书可知,“李观察”“官通州”。考[光绪]《通州志》,乾隆四十年后在通州为官的李姓“观察”只有四川锦州李调元,他于乾隆四十六年擢为直隶通永兵备道。李调元藏书甚丰,他本人曾说:“余自入官来,即好聚书。通籍后由翰林历官外道,所至皆于文章有缘。数十年来,所购所抄不下亿万卷。”^②乾隆四十九年,他谢官归乡后,成“万卷楼”,将其父及自己所存书以及为官时于馆阁中所抄本藏于其中。这与周书中所说“藏书至十餘万卷”正合。据李调元《童山自记》,他乾隆二十八年殿试中二甲十一名,入翰林院,为庶吉士,后任吏部考功司主事兼文选司、翰林院编修、文选司员外郎等职。京中为官期间与“馆阁”中王文治、纪晓岚、刘圃三、汤萼南、周雉圭、丁芷圭、王露仲、毕秋帆等皆有唱和往来^③。李调元《函海自序》(乾隆四十七年成书)则说:“余不能化于书而酷有嗜书癖,通籍后,薄游京师,因得遍访异书,手自校录。然自《汉魏丛书》、《津逮秘书》而外,苦无足本。幸际圣天子重修《永乐大典》,采遗书,开《四库》,于是人间未见之书,骈集麇至,石渠天禄,蔑以加矣。余适由广东学政任满,蒙特恩,监司畿辅,去京咫尺,而向在翰院同馆诸公,又时获鳞素相通,因以得借观天府藏书之副本。每得善本,辄雇胥录之,始于辛丑秋,迄于壬寅冬,哀然成帙,真洋洋大观矣。”这大约也就是周震荣信中所谓“馆阁中经师硕学,皆以文字相交”之事实。周震荣《上李观察书》中所称“官通州”即指李调元所言“监司畿辅”。因此,虽然从李调元的《童山诗集》、《童山文集》、《童山选集》及章学诚《章氏遗书》中未找到李调元与章学诚往来的直接资料,但从以上种种情况分析,书中的“李观察”应为李调元。

那么此书到底是何时写作的呢?李调元(1734—1803),字羹堂,号雨村,四川罗江县人。据同治四年续刊《续修罗江县志》所收杨懋修编《李雨村先生年谱》,李调元乾隆四十六年正月擢授直隶通永兵备道,四月,奉檄观察承德府属。乾隆四十六年冬,于通州建潞河书院。乾隆四十七年五月,奉旨送《四库全书》一份至盛京,中途遇雨,书籍沾湿,因此负罪落职,后绝意进取。由此可推知,这封《上李观察书》写作时间下限当在乾隆四十七年五月李调元奉旨送《四库全书》前。又据胡适、姚名达《章实斋先生年谱》,章学诚于乾隆四十四

①胡适、姚名达:《章实斋先生年谱》乾隆四十三年戊戌条,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印本,民国18年[1929]。

②李调元:《贻书录序》,《童山文集》卷六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影印本。

③李调元:《童山自记》乾隆二十八年条、乾隆三十年条。参阅赖安海:《李调元文化研究述论》(附记),现代教育出版社,2009年。

年为周震荣修《永清县志》成后,从乾隆四十四年七月至乾隆四十六年三月,一直在梁国治家课其子。乾隆四十六年三月,章学诚游河南,不得志而归,又中途遇盗,走投张维祺,主讲肥乡清漳书院。乾隆四十六年冬,张维祺移官大名,章学诚亦从至大名。想必是张初至大名,无法安排章的生计,因此,章学诚不得不回到北京。乾隆四十七年季春,周震荣调京畿任职,邀章学诚与之同行。而李调元《童山自记》乾隆四十七年条亦称:“三月,皇上驾至盘山,即余所管蓟州封内。余上下三盘,查办御道。”^①而章学诚在畿辅的这段时间内,很可能和正在查办御道的李调元有所交往。由此推知,这封《上李观察书》当写于乾隆四十七年(1782)三月至五月章学诚与周震荣同游畿辅这段时间。从“昨章进士来,仰知阁下将撰《史籍考》,此不朽盛业也”推断,很可能是李调元向章学诚谈及修《史籍考》一事。章学诚回来后,向周震荣叙及李调元纂修《史籍考》的想法,周震荣极为感奋,于是写了这封《上李观察书》。

那么,周震荣与李调元为何会有如此学术往来呢?一是周震荣为官的永清与李调元所在的通州距离很近,至李调元“监司畿辅”的乾隆四十六年,周震荣在畿辅周边曲阳、永清等地为官已有六年^②,二人于公于私都有往来的可能。二是周与李的关系很可能和毕沅有关。早在乾隆二十六年(1761),李调元就曾经和毕沅、祝芷塘、王梦楼、赵翼、程晋芳诸名士相唱和^③。乾隆三十四年,毕沅夫人汪氏卒后,李调元曾作《题毕秋帆中丞悼亡诗后》以表对汪氏的悼念。乾隆三十六年,李调元到西安,至毕沅处,与毕沅诗酒唱和,李调元曾作《呈陕西方伯毕秋帆二首》、《方伯新署中丞毕秋帆沅留饮志别》^④以表对毕沅的敬仰。另笔者又发现《童山选集》卷十收录《用毕秋帆元韵寄怀子才前辈八十并序》,其序言中曰:“子才先生,余自六七岁时已读其文。……固于视学粤东时,选刻六卷,以式多士。然吴蜀各天,不但全集未观,即鳞鸿亦未捧只字。今年四月,王心斋回南,匆匆问讯,始蒙赐报章,并惠小仓山房诸刻。乃用毕秋帆尚书祝七十韵,补祝八十,寄之。”^⑤考李调元《童山自记》,此诗当作于嘉庆元年即袁枚病故第二年四月^⑥。这表明在乾隆四十九年,李调元免官归田后,他与毕沅仍有诗酒唱和的机会。而周震荣又是毕沅“亲质光华,垂三十载”^⑦的学生,因此,周、李二人因均与毕沅关系密切,很可能会互相知名或有较多联系。

①李调元:《童山自记》乾隆四十七年条。

②周震荣《书庚辛之间亡友传后》中说:“丙申夏,与挟之至曲阳,又至永清。”(周震荣:《四寸学残存》)

③杨懋修:《李雨村先生年谱》乾隆二十六年条,同治四年《续修罗江县志》。

④李调元:《童山诗集》卷十二。

⑤李调元:《用毕秋帆元韵寄怀子才前辈八十并序》,《童山选集》卷十,清绵州李氏万卷楼补刻本。

⑥李调元:《童山自记》嘉庆元年条。

⑦章学诚:《上毕制府书》,《章氏遗书·补遗》。

现今,李调元作为四川文化名人受到学界的重视,因此,对于李调元首先提出编纂《史籍考》的这一学术发现又为李调元学术研究增加了一份宝贵的史料。

二、周震荣对《史籍考》编纂的最初设计及其影响

关于周震荣首倡编纂《史籍考》,乔治忠已进行了充分的论述^①,并且通过章学诚《上毕制府书》中“覼缕”一词,断定周震荣对于《史籍考》的编纂体例已有了较为具体的设想。而在新发现的周震荣《上李观察书》中,周氏确对《史籍考》的编纂体例进行了详细的阐述,从而更加验证了乔治忠的推断。更重要的是,周震荣关于《史籍考》体例的许多设想,都是后来章学诚拟定体例时所强调的主张,例如:

第一,对朱彝尊《经义考》既参照又指摘的基本态度。周震荣认为“《史籍考》体例自宜略依《经义考》”,但是周震荣又指出朱彝尊《经义考》在内容搜罗上的缺漏之处,因而为《史籍考》探讨更周密的编纂体例,提出许多新颖的设想。乾隆五十三年,章学诚在《论修〈史籍考〉要略》中也认为朱彝尊《经义考》“第类例间有未尽,则创始之难,而所收止于经部”^②。嘉庆三年(1798)《史考释例》中又说“朱氏《经考》,后人往往究其未至”,这实际上乃是周震荣早就有过的见解。《史籍考》的设想本来自《经义考》的启示,对之仿从而不盲从,是展现《史籍考》编纂前景的契机,章学诚于此承袭了周震荣的见解,几无疑义。

第二,《史籍考》收录范围打破史部书籍限制的总体设计。周震荣认为:“经史子集,分列四库,由来旧矣,然史所赅极广,有宜采于经、于子、于集兼及类书者。”因此他主张在《史籍考》中,要收载逸书,并从子部、集部中提取述史、论史篇卷,不能局限于著录和考述史部之书及今存之书。而章学诚在《论修〈史籍考〉要略》中谈到《史籍考》搜集范围时,提出的“古逸宜存”、“逸篇宜采”、“经部宜通”、“子部宜择”、“集部宜裁”等收录原则,实则是对周氏观点的归纳总结。周氏关于将史部图书之外的史学内容搜入《史籍考》的设想,是其力求超越《四库全书总目·史部》的主要立足点,抬高了此书的学术期望值。

第三,周震荣主张的许多具体的编纂设计,也大量被章学诚参酌和采纳。

对经部之书的搜采,周氏认为:“诸经既关于史,则本经白文即当著于录,而经义已有其书,但注‘详《经义考》’,以见详为表里之意。”后来,章学诚对于经部择采的阐述即是在此观点上的发展,如提出“今于《易》部之《乾坤凿度》,《书》部之《逸周》诸解,……俱与古昔史记相为出入,虽云已入朱氏《经考》,不得不于《史考》溯其渊源,乃使人于殊途同归之义。然彼详此略,彼全此

①乔治忠:《〈史籍考〉编纂问题的几点考析》,《史学史研究》2009年第2期。

②章学诚:《论修〈史籍考〉要略》,《章氏遗书》卷十三,民国十一年吴兴刘氏嘉业堂刊本。

偏,主宾轻重,又自有权衡也”^①等等。章学诚《史考释例》主张“今作《史考》,宜应原委,凡六经、《左》、《国》,周、秦诸子所引古史逸文,如《左传》所称《军志》、《周志》,《大戴》所称丹书、青史之类,略仿《玉海》、《艺文》之意,首标古逸一门以讨其原”^②,实为周震荣“史有大原……自黄帝六史以来,经传凡属史书一门,无论有书无书,均宜考订,名之曰古史,列于正史一门之前,乃史学大原也”议论的延伸和发展。

关于子部之书,周震荣则认为“如吕不韦《春秋》、韩非《储说》,关于记事之篇,不可不立法参取”。章学诚就此亦进行阐述:“诸子之书,多与史部相表里,如《周官》典法,多见于《管子》、《吕览》;列国琐事,多见于《晏子》、《韩非》。”^③此外,周震荣提到以往归入子部的书应考虑重新归类,列举有小说、野史杂记、类书等。章学诚曾言:“子部列有类家,而会要、典故之书,其例实通于史。”^④对于小说、野史杂记,章学诚的处理原则是“取其前人所著录而差近雅驯者,分为琐语、异闻两目,以示不废刍蕘之意”^⑤,此与周震荣的观点显然相通。

关于集部之书,周震荣指出,汉、唐、宋、元诸家之碑碣记传状谏,文集中诏诰奏议,以及论文诸书有论史者,都可归于史部。而章学诚也主张对于“传记志状之撰,书事纪述之文”应该“取其连篇累卷入史例者”^⑥。对于文集中之传记,“况内制外制,王言通于典、谟;表状章疏,荅臣亦希训、诰,是别集之通乎史矣。”^⑦

综上所述,周震荣关于《史籍考》编纂体例的具体设想,与章学诚入毕沅幕府后所拟定的《论修〈史籍考〉要略》及后来入谢启昆幕所拟的《史考释例》中所做的规划,精神一致,内容近似。

《上李观察书》最后一句“以上诸条,记忆所及如此,未足尽《史籍考》之体例也”可知,周震荣上述关于《史籍考》的一番论述,完全出于一己之见。这正验证了乾隆五十四年章学诚《上毕制府书》中“学诚始侍铃辕,在丁未之仲冬,其端自永清周尹发之。周氏见秀水朱氏作《经义考》,未及于史,以谓学途之阙。……是以覼缕于阁下,而督学诚以行役”的说法,而周震荣对《史籍考》的内容和编纂体例的见解,对于后来章学诚撰《论修史籍考要略》、《史考释例》有极大的影响。

①章学诚:《论修〈史籍考〉要略》,《章氏遗书》卷十三。

②章学诚:《论修〈史籍考〉要略》,《章氏遗书》卷十三。

③章学诚:《论修〈史籍考〉要略》,《章氏遗书》卷十三。

④章学诚:《史考释例》,《章氏遗书·补遗》。

⑤章学诚:《史考释例》,《章氏遗书·补遗》。

⑥章学诚:《论修〈史籍考〉要略》,《章氏遗书》卷十三。

⑦章学诚:《史考释例》,《章氏遗书·补遗》。

三、李调元搁置《史籍考》编纂一事的分析

胡适、姚名达《章实斋先生年谱》乾隆五十二年(1787)条下记载:“仲冬,因周震荣之介绍与启发,至河南见毕沅,欲借其力编《史籍考》,有《上毕抚台书》。”乾隆五十三年春,毕沅即为章学诚在河南开局撰修《史籍考》。而李调元虽有“将撰”《史籍考》的想法,周震荣给了他如此中肯的建议,但其在此后所有的书信、文章中,再未提及编纂《史籍考》。是否李氏仅仅顺便一说而并非真有成算?还是忙于公务把此事渐渐淡忘?亦或有其他原因?笔者以为:李调元既有“将撰”《史籍考》的想法,不能不粗具设想,在对章学诚谈论中,也必然有所叙述,但终未实施,主要原因如下:

(一) 缺乏强大的经济作为后盾。

周震荣《上李观察书》开篇即称赞编纂《史籍考》是“不朽盛业也”:“朱氏彝尊作《经义考》三百卷,毛氏奇龄叹为洋洋大观。……经之籍繁矣,史实倍之,朱氏去今又五六十年,好学之士如林,岂无志于是者,而缺焉莫继,则才不逮,力不足也。”从这句话中“才不逮,力不足”之语表明,编纂《史籍考》确实需要强大的人力、物力。如果李调元在乾隆四十七年之后仕途平稳,他很可能成就《史籍考》这一盛业。但乾隆四十七年五月,李调元奉旨送《四库全书》,因途中下雨沾湿黄箱而获罪入狱,后被流放新疆伊犁效力;旋经直隶总督袁守侗搭救,变卖家产,捐了二万两银子,才被从流放途中召回。自此,李调元深感仕途坎坷,吉凶莫测,于是绝意仕进,乾隆五十年三月,举家自通州启程回蜀。丢失官职,又加上捐银赎罪,想必会使其家庭经济空虚,因此,要想编纂《史籍考》,虽才犹在,但已是“力不足也”。

(二) 缺少官方的编书资料作为保证。

周震荣《上李观察书》中曰:“今圣天子稽古右文,特开四库馆,山崖屋壁之书,昔人悬千金不得者,尽献于朝,焕然炳然,两曜合璧,五星联珠,开辟以来,未之有也。”此言表明官方《四库全书》的修纂为编纂《史籍考》这样大型史学目录著作提供丰富的资料。后来,章学诚在毕沅幕府中主持编纂《史籍考》,他在与洪亮吉的书信中说:“三月朔日为始,排日编辑《史考》,检阅《明史》及《四库子部目录》,中间颇有感会,增长新解。《史部提要》已钞毕否?《四库集部目录》,便中检出,俟此间《子部》阅毕,即可随手取《集部》发交来力也。”^①可见,四库馆确实成为《史籍考》编纂的主要资料来源。而李调元虽然“家世藏书,有楼五楹,名曰万卷,分经、史、子、集四十厨”^②,但和“开辟以来,未之有也”的四库馆相比还是相形见绌。何况,李调元削官落职,已没有机会和权力进入四库馆中查抄资料,因此,编纂《史籍考》的设想只能落空。

^①章学诚:《与洪稚存博士书》,《章氏遗书》卷二十二。

^②李调元:《闻万卷楼火和潘东庵三十韵并序》,《童山诗集》卷四十。

然而,当章学诚向周震荣转述李氏欲编《史籍考》之意后,引起周震荣的极大兴趣,其积极性甚至超过李氏,遂有这篇精心设计《史籍考》规划的书信,向李氏献计献策。李氏最终未能动手编纂,而周震荣则始终萦系心怀。乾隆五十二年,正当章学诚处于困窘境地,周震荣以编纂《史籍考》动议进言毕沅,借此推荐章学诚入其幕府。毕沅接待了章学诚,这是《史籍考》从设想转为实际纂修的关键契机。此后,《史籍考》的纂修波飞浪涌、起伏周折,成为清代史学史一大事件。而周震荣《上李观察书》的发现,一则显示李调元早有编纂《史籍考》的设想,表明清代学术发展将此书编纂提到日程,实有某种必然的趋势,也表现出清代的私家史学并不拘守于微观历史考证活动,而是致力参与史学整体性的大总结、大清理;二是确切证明了周震荣推动此书编纂的一贯努力和重要贡献,周震荣不计得失的积极思考、献计献策,“以兴学术、以助摯友”^①,显示出乾隆年间私家学者热心于大型、总结性史书编纂的热情与识见,并非如同有些评论者所说当时学人皆自甘于琐屑问题的考订,这关乎对清代乾嘉学术的总体评论。

作者工作单位:天津商务职业学院

^①乔治忠:《〈史籍考〉编纂问题的几点考析》,《史学史研究》2009年第2期。